

个人化历史想象力——在当代精神史的构造中  
对“个人化历史想象力”的检对与重置

张伟伟

陈超学术年谱

吴昊 张凯斌 编

问题与事件

历史意识：豹变形记

余虹

诗人研究

通往父亲路——谈多多诗歌中的「父」的意涵

吴再鸿

身体地理学与「间歇」的诗意——肖开愚 90 年代诗学论

贾峰

台湾诗人夏宇的装置诗学

刘奎

一粒诗的唐诗——谈培安、希尼尔诗学诗中的认同抒写

【新加坡】张松建

叶夫图申科研究专辑

诗作品汇（娘子谷及其他）

洪子诚

恰同学少年——我在北大与叶夫图申科的会见

周锐

2016 年第五届中国新诗成就奖·授奖词

新诗史研究

《今天》诗歌与流散·美学

巫思明

CSSCI 来源集刊

NEW POETRY REVIEW

# 新诗评论

2016 年  
总第二十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诗评论·2016年·总第二十辑 / 谢冕, 孙玉石, 洪子诚主编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301-27245-9

I. ①新 … II. ①谢 … ②孙 … ③洪 … III. ①新诗评论 - 中国 IV. ① I207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8496 号

**书 名** 新诗评论 2016 年(总第二十辑)

Xinshi Pinglun 2016 Nian (Zong Di-Ershi Ji)

**著作责任者** 谢冕 孙玉石 洪子诚 主编

**责任编辑** 黄敏劼

**标准书号** ISBN 978-7-301-27245-9

**出版发行** 北京大学出版社

**地 址**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**网 址**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 @培文图书

**电子信箱** pkupw@qq.com

**电 话**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

**印 刷 者**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
**经 销 者** 新华书店

660 毫米 × 960 毫米 16 开本 17.75 印张 250 千字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**定 价** 42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# 目 录

## 陈超研究专辑

- 陈超与中国当代诗歌批评 ..... 张桃洲 (3)  
个人化历史想象力：在当代精神史的构造中 ..... 姜 涛 (21)  
对“个人化历史想象力”的校对与重置 ..... 张伟栋 (47)  
陈超学术年谱 ..... 吴 昊 张凯成 编 (61)

## 问题与事件

- “历史意识”的变形记 ..... 余 烨 (101)

## 诗人研究

### 通往父亲的路

- 谈多多诗歌中“父”的意涵 ..... 吴丹鸿 (113)

### 身体地理学与“间歇”的诗意

- 肖开愚 90 年代诗歌论 ..... 贾 鉴 (142)

### 台湾诗人夏宇的装置诗学 ..... 刘 奎 (155)

### “抒情的寓言”：

- 英培安、希尼尔现代诗中的认同抒写 ..... [新加坡] 张松建 (178)

**叶夫图申科研究专辑**

- 读作品记：《〈娘子谷〉及其它》 ..... 洪子诚 (223)  
怡园夜宴记  
——我在北大与叶夫图申科的会见 ..... 谢冕 (245)  
2015年第五届中坤国际诗歌奖·授奖词 ..... (250)

**新诗史研究**

- 《今天》诗歌与“流散”美学 ..... 亚思明 (253)  
  
本辑作者简介 ..... (276)  
编后记 ..... (278)

## 陈超研究专辑

陈超（1958—2014）是《新诗评论》的编委成员和重要作者，在他因抑郁症辞世之后，本刊同仁决定编一辑“纪念专辑”，但也一致认为不必为纪念而赶时间凑稿，而是约请相关作者撰写有深度的研究文章，把陈超作为当代诗歌批评家的贡献，他的诗学主张在当代文化思潮中的意义，以及他的批评家人格特点，清晰而具体地呈现出来。本专辑的三篇深度长文及一篇详备的批评家年谱即体现了这一目标。



# 陈超与中国当代诗歌批评

张桃洲

作为卓有建树的批评家，陈超堪称近 30 年中国诗歌的一位重要见证者。无疑，应该将陈超的诗歌批评放到 1980 年代以来中国诗歌发展和诗歌批评进展的脉络中予以考量。这里，强调陈超之于当代诗歌的见证人或亲历者的身份，是有必要的。当然，诚如洪子诚先生辩证指出的：“‘亲历者’为历史过程提供具有‘见证’性质的叙述，无疑具有其他人所不能提供的陈述……作为‘亲历者’在意识到自己的经验的重要性的同时，也要时刻警惕自己的经验、情感和认知的局限”<sup>①</sup>。对同一段历史或同一时期文学的研究，亲历者和非亲历者会表现出不大一样的切入角度和方式，这自不待言。此处强调陈超之于当代诗歌的亲历者身份，并不在于凸显其诗歌批评的“优先性”，而是为了指明其诗歌批评的一个基本特质：敏于对历史情境中的细节和气息的捕捉。他的诗歌批评以对同代诗人的观察和分析起步，在后来的推进中显示出与那些诗人成长及当代诗歌发展的极强的“同步性”<sup>②</sup>。可以说，陈超的诗歌批评伴随着其理论见解的层层深化和拓展，融入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进程中而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① 李杨、洪子诚：《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02年第3期。

② 陈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坦承：“我确实觉得一代人的事只能同代人来做，否则就是老死荒野。如果同代人不做的话，那些真正的杰出的诗人就冤大啦，我对同代人有点使命感。”见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得主陈超访谈录》，《南方都市报》2008年4月13日。

陈超开始从事诗歌批评之际，正遇上风起云涌的中国当代诗歌的潮流更迭：“朦胧诗”在激烈的论争中进入其巅峰时期并逐渐获得“经典”地位，却也面临着“盛极而衰”的窘境；与此同时，一股更新的夹杂着“叛逆”气息的“第三代”诗潮（在多篇文章里，陈超称之为“实验诗”，后来则直接使用“先锋诗歌”），已经“不可遏止”地浮出地表。在一篇为“朦胧诗”辩护的文章<sup>①</sup>里，陈超审慎地提出，应从“朦胧诗”中发掘出批评者所忽视的“现实主义因素”，他认为“朦胧诗人”“并非要脱离生活，而是要以更深刻的方式重新理解和评判生存以感知它的底蕴。他们从探求人的内心世界最深处入手，将内外现实看作处于同一变化中的两个潜在成分，并且能用一种整体上的逻辑和理智来控制诗思”<sup>②</sup>。这种关切“生存”、注重“内心”、着眼“诗思”的言说路径，为陈超的诗歌批评奠定了某种基调。

与同代一些批评家——耿占春、唐晓渡、程光炜、王光明以及稍长的陈仲义——相似，陈超最初的诗歌批评具有明确的诗歌本体意识，对诗歌的文本分析显出强烈的兴趣。他的首部论著《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》（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）和《生命诗学论稿》（为其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诗学论文及部分诗作的结集）中的大多数篇章，即充分体现了这点。这固然受到1980年代文学批评反拨历史－社会方式、追求审美自律的整体风尚的促动，但更多地源于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化、哲学、诗学思潮的影响。在步入诗歌批评领域之初，陈超与同代批评家共享着来自异域的各种新潮思想资源：“就整个80年代而言……无论是诗评家还是小说评论家，有两套书起了关键作用。一套是三联出的四五十本的‘现代西方学术文库’……还有一套是上海译文的‘20世纪西方

<sup>①</sup> 即《朦胧诗中的“现实主义”因素》，该文写于1984年6月，为收入陈超《生命诗学论稿》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，虽不是他的第一篇文章，但似可被看作其进入当代诗歌批评的起点。

<sup>②</sup> 陈超：《生命诗学论稿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202页。

哲学译丛’……受这些书的影响，我们这代人的知识系谱说得好听一点比较有活力，什么好用就用了，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有点儿精神资源紊乱。”<sup>①</sup>这种“紊乱”的西方资源连同当时活跃的诗歌创作的激发，所催生的本体意识和语言形式意趣，以及或多或少为诗歌寻求哲学依据或根基的冲动，使得这代批评家获得了某种显豁的“代际”特征，在批评观念与实践上同前代批评家区别开来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，从今天的角度回望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诗歌批评版图，似乎只有这代批评家从群体的意义呈现出相对清晰的面目。在整个1980年代，这代批评家在致力于廓清新诗历史面貌<sup>②</sup>的同时（与前代批评家一道），超越了那种简单化的诗歌历史—社会批评，建立起一种鲜明的本体论诗学——这应当是他们共同的贡献。

不过，这代批评家虽然分享着相同的思想资源、感受着近似的创作氛围，但个人性情的差异特别是汲取资源时着眼点的不同，令他们发展出各具个性的批评路径（当然他们后来各自都有不小的变化）。比如，陈超自己就总结过他与耿占春的差别：“对我影响更大的还是属于现代人本哲学的，比如海德格尔、尼采、萨特、本雅明、胡塞尔、伽达默尔，以及‘西马’诸人的著作。科学哲学里面对我本人影响很大的，到

① 李建周：《回望80年代：诗歌精神的来处和去向——陈超访谈录》，《新诗评论》2009年第1辑。程光炜也提到，“现代西方学术文库”“在当时知识界影响很大，是一套‘热门读本’。可以说，80年代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很多人的观念、知识结构都是通过它逐步形成的”。这种影响在当时产生的后果之一便是“语言的发现”，“以我个人为例，1988年前后，由于受新批评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，我写过不少以‘语言’为角度分析、阐释当代诗人作品的文章，后来结集为《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》出版”（见程光炜《文学讲稿：“八十年代”作为方法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05、114页）。作为该“文库”主要策划者之一的甘阳，多年后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了“文库”形成及其发生影响过程中所包含的“诗化”成分，见查建英：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6年，第198—199页。相关讨论亦可参看贺桂梅：《“新启蒙”知识档案：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22—223页及334页以下。

② 陈超的《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》可看作一种个人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谱系建构的努力，加入了当时研究界已经开展的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掘与梳理中。

现在依然起作用的是波普尔的著作，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》它整个改变了我的世界观，从方法论上是《猜想与反驳》。……耿占春一开始就受神话诗学、文化诗学，主要是受卡西尔的影响。《人论》我也读过多遍，但是它从语言的产生开始谈人，人是符号的动物，最后谈到了艺术和诗歌；这对于我来说感觉太遥远，我要解决最迫切的东西，想谈当下中国的先锋诗是怎么回事。”<sup>①</sup>的确，耿占春的早期代表性论著《隐喻》（东方出版社，1993年）尽管也十分关注诗歌语言，但它偏重于从神话学、文化学甚至人类学的维度，从普遍诗学的视角进行探讨，其看重的不是现象分析而是理论归纳<sup>②</sup>。而陈超诗歌批评的重心，一开始就落在当代诗歌现象和问题的剖析与评判上，其方法则是基于大量的文本细读。

对于陈超而言，之所以要大力倡导和实践文本细读，除了上述影响（尤其是同时引入的英美“新批评”理论<sup>③</sup>）的因素外，还由于其内在理论需求的紧迫性：“对诗歌评论者而言，其个人方式只能是对文本的深入”，“从价值论上看，细读法是唯一能抵进最高限值的努力”；<sup>④</sup>“细读是我们从事批评活动的起点，我们应有能力吸收转化其优长”，“批评家可以采用任何有效的理论进行批评运作。但有没有对文本的‘细读’这个起点是不一样的”。<sup>⑤</sup>由此，文本细读和以细读为核心方法论之一的新批评，就成为陈超诗歌批评的真正起点和理论基石，并对他后来的诗歌批评（虽经深化和拓展）产生了持续的影响。在当时的陈超看来：“‘新批评’是一种变格的形式主义文论，与其它形式主义相比，它又是最关心对文本意义及生成的诠释。对当时的我来说，理解它正合适。诸如文

① 李建周：《回望 80 年代：诗歌精神的来处和去向——陈超访谈录》，《新诗评论》2009年第1辑。

② 顺便说一句，耿占春的近著《失去象征的世界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）相较于他以往的诗歌批评，在关注点和论述方式上有了很大变化，但仍保留了神话学资源的些许印痕。

③ 陈超自陈：“当时赵毅衡的《新批评——一种形式主义文论》和他编的《新批评文集》也出版了，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”，且“新批评和我以前读到的两套文库发生了纠葛”。见李建周《回望 80 年代：诗歌精神的来处和去向——陈超访谈录》。

④ 陈超：《谈诗论方法的颠倒》，见《生命诗学论稿》，第 118 页。

⑤ 陈超、许仁：《“愚人志”或“偏见书”——诗论家陈超访谈录》，《山花》1998年第9期。

学的本体依据和自足品质，语境理论，文本内部矛盾意向的包容与平衡，反讽，张力，玄学性，含混，‘意图迷误’与‘感受迷误’……特别是文本分析‘细读’法，都深得我心。”<sup>①</sup>于是，从1985年秋到1987年末，他“每天必做的功课是解读一首有难度的现代诗”——那些“功课”的成果，便是一部《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》。尽管后来他的视野转向了“文化观念、价值向度”，但仍旧在“讨论写作本身”，这显然受到了新批评的“潜在支配”；因此陈超一再强调：“至今我仍未放弃新批评有价值的地方。比如文本细读，它永远是有效的乃至必须的。”<sup>②</sup>

值得注意的是，陈超对新批评的理解富于辩证性，对于当时急速涌起且被引介到国内、一般被视为具有消解或“破坏”性的解构理论，及其与新批评的关系，他的看法明确而清晰：“西方解构批评并不是‘新批评’简单的天敌，从基本意识上，它是新批评最近的‘亲戚’。解构主义之‘解构’，也是建立在对文本的细微构成，尤其是语言修辞特性的关注上。他们不满意新批评的‘细读’，是意在更进一步的‘超级细读’。这是很关键的地方。他们将细读、含混、复义、悖谬、歧义、反讽等因素强调到极点，必然导致‘文本有机自足’的失效。在文本意义的自由争辩中，解构批评家的确揭示了只能经由他们揭示的重要方面，文本具有了新的活力和开放性。但这种活力和开放性，都是批评家在细读文本中的每个字词、句群间的隐秘关系时，延伸、接引出来的。”<sup>③</sup>无疑，这是一种相当“超前”的意识，可谓抓住了解构理论的要害，即便从当下的眼光看也依然合理。

一方面或许是得益于解构理论的启发，另一方面更多地源自他本人的理论探索的内驱力，陈超在自身的诗歌批评实践中，在坚持新批评及其细读法的同时，又对之进行了改造。按照陈超的说法，他“汲取的是新批评文本分析的态度，但是在分析文本时不会把一首诗的历史语

<sup>①</sup> 陈超、许仁：《“愚人志”或“偏见书”——诗论家陈超访谈录》，《山花》1998年第9期。

<sup>②</sup> 同上。

<sup>③</sup> 同上。

境封闭住”<sup>①</sup>，他认为“在具体运作中，我们应放开眼量，读出更多的东西，而不是局囿于一隅”<sup>②</sup>。可以看到，无论是集中于《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》(及后来的《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》)里的文本细读，还是《中国先锋诗歌论》中“建立在细读的基础上”的诗人论，大都没有孤立地对文本、诗人进行分析或讨论，而是引入历史、文化等因素，试图探掘诗歌中超出语言、形式的意涵和价值。综观陈超各类著述里的文本细读，其中似乎鲜有单纯从形式(行句、音韵、节奏)角度分析诗歌的文字，它们总是把对形式的勘察滑向其他层面，如关于多多诗作《我读着》的解读：“从开始的‘十一月的麦地’到结尾的‘伦敦雾中’，像一条历经沧桑的溜索两端的扣结，坚实而完整地抻起了这首诗的时空喻指；而在弯曲柔韧的溜索中间，有多少心灵的细节，可能的语象撞击速度，感觉的迂回升沉。还有，在溜索之下又有多少逝水的温暖召唤和凶险的漩涡！”<sup>③</sup>在此，“喻指”朝向了“时空”主题，“语象”“速度”连接着“心灵的细节”“感觉的迂回升沉”，本已具有形式象征意味的“溜索”隐含的则是“温暖召唤和凶险的漩涡”。他大概将那种孜孜于字句、行节的形式分析，归为他所说的“美文意义上的修辞分析”了。

① 李建周：《回望 80 年代：诗歌精神的来处和去向——陈超访谈录》。

② 陈超、许仁：《“愚人志”或“偏见书”——诗论家陈超访谈录》。

③ 陈超：《游荡者说》，山东文艺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 173—174 页。倘若比较一下陈超《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》中对美国诗人毕晓普诗作的解读，和爱尔兰诗人希尼、美国学者斯图尔特分别对毕晓普诗歌的分析，也许更能说明问题：陈超注重毕晓普诗作中“由个体生命经历中细碎的、闪烁的痛楚，折射出无边的生命和历史悲情”(《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》上册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16 页)，希尼则留意毕晓普诗歌中的“口语化的调子”“具有绝对说服力的内在节奏”(《希尼诗文集》中译本，作家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248—250 页)；而斯图尔特的分析凸显了毕晓普诗歌的“韵律结构”“声音与意义的关系”(《诗与感觉的命运》中译本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108—111 页)。这里的比较不会得出孰优孰劣的评判，只是彰显各自不同的理论偏好。

## 二

由此看来，虽然陈超秉持鲜明的本体论立场，但他的诗歌批评自始至终就不属于纯然的“形式诗学”范畴，它们不仅与同新批评一并传入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相去甚远，而且也偏离了他为之倾心的新批评理论。他在对诗歌语言、形式的理解和阐释中，带进了较多的历史、文化成分；更重要的是，他为他的语言本体加入了一重格外醒目的维度——“生命”，从而使其诗学观念建基于“语言—生命”本体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“生命诗学”——其中，语言与生命（生存）是紧密联结在一起、不可分开须臾的。陈超曾总结其诗歌批评的“两项任务”：“其一，立足文本细读和形式感，并经由对诗历史语境的剖析，揭示现代人的生命／话语体验”；“其二，稍稍逸出诗学的个别问题，将之放置到更广阔的哲学人类学语境中，在坚持诗歌本体依据的前提下，探究其审美功能”；而贯穿其中的“一条线索”，是“研究个体生命—生存—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”。<sup>①</sup>他的一番夫子自道，既表明了自己的理论目标，又呈现了他的批评进路：“坚持诗歌的本体依据，面对文本并进而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与语言间的复杂关系……探询人与生存之间那种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。”<sup>②</sup>与其说他的本体论立场推崇诗歌的语言（形式），不如说它更看重语言（形式）背后的与生命相连的自由、心性、存在、担当等精神性内质：“构成诗歌的材料是语言、字词，本身具有一种精神指向。所以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纯艺术的神话……越不纯就越纯”<sup>③</sup>；“作为中国诗人，我们大家缺乏的现代形式感已经通过艰苦的阅读和摹仿而拥有，但一个基本意识却从一开始就忽略了。它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精神运行的向度！”为此他甚至宣称：“如何保持汉语诗歌的锐利和纯洁，正义和

① 陈超：《生命诗学论稿》“写在前面”。

② 陈超、许仁：《“愚人志”或“偏见书”——诗论家陈超访谈录》。

③ 李建周：《回望 80 年代：诗歌精神的来处和去向——陈超访谈录》。

尊严，在局部的形式上的努力只能是第二义的问题。”<sup>①</sup>当然，他的这一表述，有别于那种把形式视为附庸甚至要取消形式的教条式主张。

以陈超的生命诗学观之，在现代诗中语言和生命（生存）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混合体，不存在与生命无关的语言，也不存在不依傍语言表达的生命呈现，二者相互渗透、互为表里：“现代诗从意味上最主要的特征是对生存的领悟（apprehend）”，“从内在精神上永远不会也不能放弃这种标度：它是一种词语的存在形式对生存／生命存在形式的揭示和对称。它以坚卓连贯的自足运动，和词语间不懈的推进，显示了人对其宿命的永恒反抗”；“对诗人的有限生命来说，只有从事关个人的具体处境出发，加入广博的对人类生存或命运的关怀不断深入，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个我精神的不被取消”<sup>②</sup>。在他为某辞典撰写的“现代诗”词条里，更有如是论断：

（现代诗）是源自生命底渊的欣悦和疼痛，是语言与生命尖锐的相互发现与洞彻，是回击死亡的圣物，是背负十字架又在天上行走的心路历程。正是在这种巨烈而充满快感的残酷摩擦中，在纯粹灵异的形式感体验中，他发现活着是值得的……因此，现代诗与现代人的生命是同构的。

生命意志对历史决定论的逾越，原始冲动对理性教条的逾越，精神自由对物利欲求的逾越，个我生命对生存压力的逾越，人在死亡之前与死亡的对峙和人对自我局限的逾越，这一切——构成了现代诗最噬心最了不起的基本命题。

决定诗之为诗的重要依据是诗歌素质上的浓度与力度，诗歌对生命深层另一世界揭示和呈现的能量之强弱……直观、错觉和幻觉，

<sup>①</sup> 陈超：《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》，见《生命诗学论稿》，第5页。

<sup>②</sup> 陈超：《精神大势》，见《生命诗学论稿》，第77、79、80页。

白日梦和种族记忆，通感和移情，象征和语音漂流，生存结构和个体生命结构，复杂经验和深度文本……这一切，均在现代诗的形式中得到深度综合处理。<sup>①</sup>

这种“对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”和“对本体和功能”的“同时关切”，使陈超“进入对生存、历史、文化、语言的综合思考……它牵动了美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连接域，使诗歌形式本体趋向与之相应的具体生存语境中的生命本体”<sup>②</sup>。这也使得陈超的不少批评文章（如《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》《深入当代》《诗歌信仰与个人乌托邦》等），具有了“性质含混的泛文化语言批评”特征。

不过，正如陈超自我辨析的，其生命诗学“不是纯然探究生命问题，而是探究生命体验在语言中的转换关系，它是一个写作问题”，“不是要在生命冲动和历史写作的冲突中简单‘站队’，而应把握这种冲突，并就在这种冲突中寻求异质扭结的现代诗性”；而且“不是单考虑‘生命本原’问题，还要考虑其在历史、文化、生存、语言中的变异。因此，我试图在‘生命诗学’中综合处理生命冲动、生命意志、无意识、主体移心、症状阅读、交往理性、语义学、修辞分析，特别是历史话语和历史写作理论”；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：“诗人应为噬心的生存情境命名。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、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，完成其对当代题材的处理，如此等等。”<sup>③</sup>在陈超关于其生命诗学的阐述中，始终将语言与生命并置，并强调二者的相互依存与诗歌创造的能动关系：“汉语先锋诗歌存在的最基本模式之首项，我认为应是对当代经验的命名和理解。这种命名和理解，是在现实生存—个人—语言构成的关系中体现的”，“先锋诗歌对当代话语的占有，我不是指那种表面意义上的‘时代感’、‘主旋律’，而是指生命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与当代核心问

① 陈超：《生命诗学论稿》，第93、94、96页。

② 陈超、许仁：《“愚人志”或“偏见书”——诗论家陈超访谈录》。

③ 同上。

题在语言上发生的冲突、互审、亲和等关系”；<sup>①</sup>“真正的诗性正来源于对个体生命与语言遭逢的深刻理解”，“在今天，诗不再是一种风度，而是诗人烛照生命和语言深处的一炬烽火”。<sup>②</sup>概而言之，现代诗在本质上即是一种生命诗学，是通过处于胶着状态的“语言—生命”而完成的诗性书写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生命诗学所包含的种种理念成为陈超诗歌批评极为关键的立足点。

不难看出，作为陈超诗歌批评核心观念的生命诗学，既有他观察和思考的中国当代诗歌<sup>③</sup>的促动，又与前述他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影响不无关联，那些西方思想具体来说就是包括生命哲学、生命意志论、存在主义等在内的现代人本主义哲学，他在吸收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发挥：“80年代我接受生命哲学中对‘生命’一词的给定。比如狄尔泰认为生命是混茫的意志，是非理性的神奇体验；柏格森认为生命像一系列难以遏止的洪流，只能靠直觉来领悟；由此发展到叔本华、尼采的生命意志理论。今天，我仍认为它们是有效的。但我更‘完整’的想法是，在诗学写作中，‘生命’在吸收此前已存内涵外，应自觉摄入更广阔的东西。‘生命’有自在的成分，也有‘自为’的成分。它受到生物的、心理的、历史的、文化的、语言的牵制，呈现复杂结缔状态。因此，在现代条件下讨论‘生命’，厘清其基本结构，就离不开对这一切的同时关注。”<sup>④</sup>这些不同流派、本有着历史演化过程的思想资源，被陈超“共时”地接受后，又与其他他所认同的诗学和文学资源（瑞恰兹、艾略特、罗兰·巴特等）“融汇”在一起，共同“铸就”了他所理解的“生命诗学”。与他的文本细读对新批评之封闭、内化的“扬弃”相似，陈超的生命诗学在借鉴生命哲学的“生命”内涵之余，又吸纳了“历史的、文化的”等“更广阔”因素。

<sup>①</sup> 陈超：《深入当代》，见《生命诗学论稿》，第20、22页。

<sup>②</sup> 陈超：《现代诗：个体生命的瞬间展开》，见《生命诗学论稿》，第25、27页。

<sup>③</sup> 特别是1980年代“第三代诗”运动（包括女性诗歌兴起）所表现出的生命意识。

<sup>④</sup> 陈超、许仁：《“愚人志”或“偏见书”——诗论家陈超访谈录》。